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外文学交流:

吸收借鉴 交融创造 影响世界

□本报记者 王 杨 宋 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放眼世界,引进翻译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范围、传播载体等几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文学作品“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存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中外文化交流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丰硕成果。

译介 吸收 影响 交融

论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外文学交流,浙江大学教授许钧首先想到了五四运动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那就是以开放的精神引进域外的新思想、新观念,改造我们的语言,丰富我们的文学,革新我们的思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学界秉承了五四的开放精神,通过中外文学的交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许钧提出几点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首先是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能够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去关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70年来,我国文学翻译界向国人译介的文学作品涉及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通过译介,拓展精神疆域,促进文学创造。从70年来的中外文学交流看,我国的文学界没有陷于对外国文学的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借鉴,以异域明镜照自身,激发自身的创造性,创造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正如许钧所说,中外文学交流,翻译是必经之路。文学杂志的创办和世界名著的译介构成了中国读者了解外国文学的主要途径。1953年创刊的《译文》杂志,于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至今已成为中国读者了解外国作家作品的一扇重要窗口;被读者亲切称为“网格本”、于50年代末启动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收录了一大批在世界文坛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陆续创办的《外国文艺》《译林》等杂志以及如雨后春笋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为开拓中国读者的世界眼光做出了贡献。《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莫言、陈忠实、余华、宁肯等小说家的写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同样,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布莱克、波德莱尔、里尔克、帕斯等外国诗人,北岛、多多、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诗人也一定会走上不同的诗歌之路。可以说,正是吸收、影响和交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吸收,影响,交融,发出自己的声音,许钧与高兴都强调了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互动性和对话姿态。他们谈到,改革开放40余年,文学交流和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近几年中外文学交流抵达某种更高境界,同中国国力

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是有直接关联的;反过来,文学交流又为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影响力发挥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文学 世界表达

拥有十多年的外国文学出版经验的出版人、版权代理人彭伦认为,“文学走出去”的实质是出版行为。正如出版社选择外国的选题购买版权一样,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也应该像引进一样,走符合国际出版规律的途径。他列举麦家、张翎、李兆基等作家在海外市场取得很好成绩的国际版权作品,证明中文作品并非没有国际市场。他告诉记者,对于小说《繁花》,纽约FSG出版社从写审读意见到最终决定签约几经波折。拥有70多年历史的FSG出版社旗下拥有2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3位普利策奖得主和24位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它签下《繁花》英文版权的消息迅速传遍国际出版界,日本早川书房、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很快跟进,如今《繁花》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权也已售出。此外,小白《封锁》、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那多《十七年间谋杀小叙》、霍艳《李约翰》部分语种的版权也已售出。彭伦表示,国际版权代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耐心摸索,寻找更有效的途径。

国际文学交流频繁

近年来,中国举办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为加强和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实际贡献。

中国作协率团参加各大国际书展;组织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翻译工作坊和国际写作营;与美、俄、韩、日、法、意、澳、葡、西等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建立并发展有长效机制的文学交流平台——文学论坛……通过上述活动,搭建对外文学交流平台,丰富文学交流内容,拓展文学交流渠道。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鲁迅文学院的“国际写作计划”、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写作计划、“湄公河文学奖”等活动,也对国内外作家的深层交流和互动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邀请到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勒克莱齐奥、巴尔加斯·略萨、索因卡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马丁·瓦尔泽、阿摩司·奥兹、哲迈勒·黑托尼等国际知名作家访问中国,同中国作家与读者深度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写作中心不定期举办的翻译坊是国内外作家深度交流和对话的有益尝试。

70年后的今天,中外文学的互译和交流频繁,形式多样,形成了层次分明、点面结合的新格局。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以更为自信的姿态站立于世界文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真实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情感、思想,书写各民族由旧的社会形态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具有独特价值;同时,少数民族文学鲜明独特的风格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面貌,成为当代文学极富魅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内涵 日臻丰富

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新文学”的属性和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重视,这也表明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决心,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汉语文文学创作快速发展。

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认为,在中国文学大家庭里,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对民族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大力支持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协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统筹规划、面向基层、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推出了一批扎根祖国大地,深入人民生活,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爱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作家诗人,推动了民族文学的全面发展。

甘肃省作协主席马步升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人口较多、历史文化传承久远的少数民族,其文学形态由原来的古典状态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状态;许多人口较少民族,更是由口传文学进入到现代书写状态;一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则开启了本民族文学书写的历史。如今,无论是人口较多民族,还是人口较少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队伍和代表性作家,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平在全国也属一流。中国文学的发展成就中包含少数民族作家的贡献,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正与汉族作家一道,成为“中国文学”旗帜下不可或缺的成员。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令人欣喜的风貌,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亮丽的色彩,56个民族的文学成果在祖国大花园里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如今少数民族老中青作家群落梯队完整、名家与文坛新秀并驾齐驱,小说与诗歌成就颇丰,各类题材均有不俗之作,以母语创作的多语种文学作品得到进一步传播,评论及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显著加强。

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是精神内核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伊始,就把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当作一项关系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的伟大事业来看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作协名誉主席特·官布扎布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里,民族文学之花开遍了中华大地,不仅极大丰富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如今,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民族兄弟们相互间敞开心扉、增进了解、加深认识的纽带,为促进民族团结发挥着独特作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石舒清表示,缺失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是不可想象的。读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红尘慈悲》时他在心底感慨,这样的文学在回族文学里是没有的,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里也未必有,但可以引以为豪的是,它确实又是属于“我们的”文学。

独特美学丰富当代文学面貌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外文化交流和交往不断扩大,文化语境发生了新变化,创作群体的民族身份意识更加明确,作品的民族风格呈现出新趋向。在现代化诉求和全球化浪潮双重冲击下,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主动选择在创作中塑造新的民族形象。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点上,一些在多元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文学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对“世界性”主题的开掘。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名誉主任丹增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走向了全国,而且向世界敞开胸怀,涌现出一大批不同环境、不同习俗、不同文化、不同阅历的各民族作家。他们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大胆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有益营养,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优秀新作被译介到国外,许多艺术手法高超的作品在国外频频获奖,许多创作风格独特、题材内容新奇的作品受到读者青睐。

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尼玛潘多说,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藏族先民得以在高寒地区生存繁衍,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忽略的,这样精神传承至今,体现在坚韧的民族性格和悲悯宽容的人文情怀中。如果要传达和体现这种精神,必须学会审视和反思传统文化,懂得拂去罩在生活之上的任何虚浮,抓住生活的本质,在保留鲜明民族性格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生活温度的作品。惟其如此,具有独特民族性格的文学创造才能被其他民族接受和认同,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谈到,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群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既植根于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具有独特美感的文学样貌,或犀利劲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多举措持续助推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党和国家、各级作协组织的重视和各民族作家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

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同年,中国作协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1981年,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同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至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11届,总计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获得“骏马奖”表彰。“骏马奖”的设立深刻地推动和引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和知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各项举措的持续发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会员队伍日渐壮大。据统计,目前中国作协会员共12211人,其中少数民族会员1464人,占比12%,少数民族会员人数逐年稳步增加,并覆盖55个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壮大,有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谈到,作为由中国作协主管的唯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2009年创办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2012年创办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出版汉、蒙、藏、维、哈、朝等6种文版,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期刊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对推动母语阅读与创作、促进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再次扩版,进入刊发长篇作品的期刊行列。

青海省作协副主席曹有云结合自己在青藏高原持续近30年的文学实践谈到,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作家正好赶上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最好历史机遇期。“几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好比滔滔江河,奔腾前行,波澜壮阔。值此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尤其庆幸我不是站在岸上的看客,而是这壮阔江河中的浪花一朵,得以汇入文学的巨流、梦想的长河。缘此,由衷感谢中国作协,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和敬爱的祖国!”